

# 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 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6~10

2016年5月30日

\*\*\*\*\*

## 南怀瑾先生与中国文化

古国治<sup>1</sup>

南怀瑾先生一生与中国文化脱离不了关系，首先，南先生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，他自幼受中国私塾教育，背诵四书五经，练过武功，求仙访道，最后学佛。在四川禅宗宗师袁焕仙处悟明心性之后，且经过真修实证，对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自有独到的领会，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儒家的修心养性、尽心知性和道家的修心炼性。因为有此修养，所以他在台湾虽然过着无立锥之地的贫困日子，却不以为苦，仍然宾客往来谈笑风生，仍然坚持教化学生，仍然坚持读书作学问，仍然坚持静坐修定转化身心性命，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，也可以说他乐在其中。

他在台湾弘扬佛法的过程中，因不吃素又娶妻生子，佛教界有人曾经骂他大魔王，他亦不以为悔。他讲学出书，有的大学教授说他不入学

---

<sup>1</sup> 2016年5月12日写于庙港。

术之流，他也无所谓，为了让中国文化普及民间，他自有主张。向其求教者，遍及三教九流，上有达官贵人，下有贩夫走卒，然而却自称没有学生。

南怀瑾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，13岁之前就点阅《资治通鉴》三次，18岁于杭州孤山文澜阁藏书楼阅《四库全书》，读经史子集，于秋水山庄阅道家秘本书籍，26岁于峨眉山大坪寺闭关阅《大藏经》，28岁出关后又转至四川乐山五通桥闭关，阅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备要》。他不仅读二十五史，更读野史、笔记，终其一生不断阅读中国各种古籍及现代书籍，他的藏书犹如一座小型图书馆，在讲解《论语》的《论语别裁》书中，引用中国古籍多达80多种。他因爱好阅读古籍，好学深思，深深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，打下了弘扬中国文化的基础，否则光有志向，没有学问见识，如何实现心愿。他说自己是爱好中国文化的老顽固，常以唐人刘方平的诗自况，“朝日残莺伴妾啼，开帘只见草萋萋。庭前时有东风入，杨柳千条尽向西。”面对西方文化的大潮，面对国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，他犹如古老中国文化的一个白头宫女，凄凉孤单地始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优越性。

他更是中国文化的弘扬者，到台湾后，他找人学佛，印佛经，办禅七，提持佛法心宗；接着应聘到大学授课及演讲，也应邀到军中巡回演讲，创办“东西精华协会”，讲述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禅学；办过出版社，办过《人文世界》杂志，传播人文思想，强调精神文明；为培养僧才，在其主导下办了“十方书院”，并亲自讲课及主持禅修。寄居美国和暂住香港期间，讲课亦未中辍。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以八九十高龄，仍在讲学，尽其一生均在弘扬中国文化，他以唐末洞山良价禅师的诗形容自己，“净洗浓妆为阿谁，子规声里劝人归。百花落尽啼无尽，更向乱峰深处啼。”有其悲愿，有其无奈。其讲课内容整理出书，

涵盖儒释道已达 60 余册，他的书在 20 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热销，有助于国人学习传统文化。其在书中处处透露出他对中国文化衰亡的担忧，也充满了他对中国国家民族强盛的信心。

## 他为什么要弘扬中国文化

### (一) 时代背景

南怀瑾先生生于公元 1918 民国七年，这是新旧文化交替、国事动荡变动的年代。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，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侵害，为了图强救国，乃有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张之洞、李鸿章为主导，主张“师夷之长以制夷”的自强运动，学习洋务，造枪炮，造轮船，练新兵。到了中日甲午战争，清朝战败，对中国民族自信心更是一大打击，更进一步怀疑不是国防武力出问题，而是政治体制出问题，遂有维新变法，改行君主立宪，可是因慈禧太后之阻挠而未能成功。接下来是改朝换代，民国成立，实行西方共和体制。此时在人文方面，新译西书不断涌现，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中国，成为时髦。1919 年由陈独秀、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，提倡白话文，打倒孔家店，喊出“民主与科学”口号。此时已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，而是全盘西化，烧香拜佛被视为迷信，中医被视为不科学，教育也改向西方学习，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、社会风俗、宗教信仰被全面否定，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，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和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。再加上文化大革命，破四旧，批孔扬秦，中国文化已摇摇欲坠，命如悬丝。

## （二）抛弃中国文化 社会面临的问题

孔家店被打倒之后，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中国陷入了八年痛苦的抗日战争岁月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接下来又有国共内战，国民党战败，迁往台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在国防上发展武力，研发原子弹，让西方列强不敢藐视中国。毛泽东过世之后，邓小平走改革开放路线，发展市场经济，先让一批人富起来，短短几十年，中国崛起，摆脱了贫穷落后，中国富了，中国强了，但是问题随之而来。

当年为了打倒孔家店，鲁迅与吴虞曾经猛烈抨击礼教吃人，中国人丢掉了儒家礼教，不再克己复礼，不再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变成物欲横流，一切向钱看。为了金钱不择手段，失去了孔子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的道德修养，官员容易贪污腐败，商人失去道德底线之后，造成假货盛行，食品不安全。目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、欺诈、腐败现象，在假冒伪劣和欺诈的背后，本质上是道德危机，道德价值观迷失。近年来相继发生的“毒奶粉”、“瘦肉精”、“地沟油”、“彩色馒头”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，农药、激素充斥在日常食用肉类、水果、蔬菜之中，令人食不安心。相关调研表明，近七成人对中国的食品状况“没有安全感”。连关系人身健康甚至生命的食品、药品都敢去假冒伪劣，可见这些人的良知缺失到了何等地步，也意味着社会道德底线已被击溃。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有良心自责，只要能赚钱，只要能成名，一切皆无不可。当社会道德底线失守，“缺德”现象蔓延为社会常态，“逐利”成为全民行为取向，这个社会如何不“病”？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，德法相辅相成。当今中国法治、德化、社会管理都未步入正轨，因而乱相不已。

长久以来，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，道德诚信缺失问题一直存在，

其他不道德现象和社会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存在，如许多人规则意识淡漠，知而不行，禁而不止，随意违规，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，甚至有些时候或某些领域出现“法不治众”的无奈结果；一些人缺乏他人意识和公德意识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甚至缺乏基本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规则法律的遵守，“以人为本”变成“以我为本”，利己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拜金主义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。失去传统的诚信，人与人互不信任，不讲仁义，社会变得冷漠自私。在科学的口号下，视信仰为迷信，一般民众不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相信因果，变得投机取巧，无所畏惧。

这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问题，南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科技的发达带给人类的便利，但是不能带给人类幸福，科技与资本家的结合反而使人迷失在物欲横流之中。西方物竞天择的思想，让世界处在不断的战争之中，与不断的以强凌弱资源掠夺之中，以及不断的破坏地球环境之中。他也看到了中国人自己抛弃了传统文化之后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信之后的不安，在追求金钱追求物欲，失去了精神追求之后，人变得没有理想，浑浑噩噩过一生。而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、心物一元、世界大同思想有助于人类之和平发展，中国儒释道的心性之学有益于人类追求幸福和安定社会人心。在南怀瑾先生看来，中国文化是个大宝藏，无论是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国防、经济、生命科学，五千年之文化自有其长处，弃自己之珍宝而不顾，实在可惜。他总结历史之经验，认为国家亡了，可以复国，文化亡了就没了，例如佛教文化在印度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他忧心忡忡极力弘扬中国文化。

## **普及儒释道文化 延续中国文化命脉**

要弘扬中国文化，除了讲学之外就是著述，南怀瑾先生的书大都是

由讲演整理而来，有的学者教授批评其著作不够严谨，难入学术之林。南先生曾在台湾之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任客座教授，他无意走学院派之学术路线，自有其考虑。他 36 岁所撰写之《禅海蠡测》，公认是中国文化的传世经典之作，内容除了关于禅宗之演变、宗旨、公案语录、机锋转语、神通妙用、参话头、佛教教理、禅定之外，更论及丹道、密宗、净土以及理学，还有西洋哲学、科学等等，其所引述之书籍包括佛经、禅宗语录、道藏、云笈七签、神仙传、悟真篇、指玄集、象山全集、宋元学案、明儒学案、朱子全集、太极图说等等。读《禅海蠡测》，方知南怀瑾先生学问之广博，古文功底之深厚。

这本著作是南先生有感于日本铃木大拙在西方讲禅，禅学在西方大为流行，而当时著名之台湾某学者自贬中国文化，否定中国之禅宗，所以南先生特地在书的背面，印上“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战”。不过，这本书要看懂并不容易，不要说佛法禅宗之莫测高深，不可思议，若无一定之古文基础，恐怕连文字都有障碍。

自唐代以来，儒释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，南怀瑾先生讲述和著述了儒家的论语、孟子、大学、中庸，道家的老子、庄子、列子、参同契，佛家的心经、金刚经、圆觉经、维摩诘经、楞严经、楞伽经、药师经，这些儒、释、道的主要经典大部分经过讲演记录整理出书。其中《楞严大义今释》和《楞伽大义今释》是语译，他认为研究《楞严经》，对宗教、哲学、科学以及宇宙、生命、人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，但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是伪经，而且新佛学研究派把《楞严经》说成是真常唯心论的外道理论，担心《楞严经》被误导被淹没，所以在艰苦的环境下，将《楞严经》译成白话，以广流通。

《楞严大义今释》于 1960 年出版之后，又因《楞伽经》在唯识法相学之重要性，不仅如此，禅宗更以楞伽印心，于是又将《楞伽经》译

成白话。《话说中庸》则是他于1998年寓居香港时亲自所写。

为了普及儒释道文化，他不走学术路线，以通俗易懂、生动有趣、深入浅出的方式，让一般大众都能接受。南怀瑾先生的通俗其实并不肤浅，也不低俗，不仅义理高深，启发人的思想，而且常会引用历史故事和诗词来说明，加上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作批注，读起来趣味无穷，他认为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人人听得懂。不仅如此，南怀瑾先生对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，经常以佛家解释儒家道家，或以道家解释佛家儒家，互相引证。例如讲到孔子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则引用佛家的禅宗悟道来解释，堪称一绝。他在著述所展现出来的，的确是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。经纶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”不管是儒家也好，道家佛家也好，南先生的书籍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，这对复兴中华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，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国学热潮是否受此影响，不得而知，但是南先生为了延续中国文化命脉的心愿却很清楚。

至于有人说他不入学术之流，在《论语别裁》前言中，他说自己只是个人一得所见，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，不入学术主流。他的著述是否因通俗或考据不够严谨而无学术价值呢？是否在学术文化上没有建树呢？那就留给有识之士、明智之人去评断吧！

## **替孔子平反伸冤 重塑圣人形象**

南先生讲述《论语》始于1962年，但是只讲了前六篇。1974年4月应邀台湾“大陆工作会”开讲《论语》，由蔡策速记后整理成文字，取名《论语别裁》出版，很快成为畅销书，轰动朝野，改变了一般人对孔子的刻板印象。自古以来都把《论语》当成一句一句的格言来读，甚至有人主张重新编排，而南先生则认为《论语》的篇章是有宗旨、有条

理、有秩序的，前后呼应不可分割，这是孔门弟子的悉心安排，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南先生的创见，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明清科举考试，规定四书以朱熹的批注为准，因此六七百年来，孔孟思想都被限制在朱熹的思想中，读朱熹的批注，形成了对孔子刻板不近人情的印象，严重造成对传统文化心生反感。南怀瑾先生所讲述的《论语别裁》，大胆推翻了几千年来前人的解释，例如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，重不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样子，而是自尊自重自信。“无友不如己者”，不能解释成不可以结交不如自己的人，应该是没有一个朋友不如我，不可以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否则孔子成了势利小人，否则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”如何解释。又如宰予昼寝，孔子感叹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”，按照过去的说法，孔子看到宰予白天睡觉，觉得不可救药，骂他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”。南怀瑾先生认为宰予是孔门中的高才生，只是身体不好，因而感叹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”，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。如此一来，孔子不是板着脸孔的老学究，而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

对于孔子见南子后子路不高兴那一段，南先生亦有不同于宋儒的解释，孔子有其通达高明之处；另外，孔子也不是只会讲格言式的人伦道德，他还有形而上的哲学思想，“子罕言利、与命、与仁”，孔子只是少讲，不是不讲，更不是不懂；南先生在解释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就是由静定修养归到天人合一、物我同体的仁境。在《论语别裁》中诸如此类的地方有一百余处，把被宋儒扭曲的孔子形象重新导正过来。否则孔家店被打，孔子被打得很冤枉，他在《论语别裁》中说该打的是孔家店的伙计，而不是老板，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，要不是南怀瑾先生替孔子平反，孔子不知道还要被冤枉多久，《论语》的价值不知还要被埋葬多久。



## 返还大学原本面目 阐述内圣外王之道

南怀瑾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返还《大学》的原本面目，《大学》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写的一篇学习心得论文，原来编排在《礼记》中，从宋代开始，把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抽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成四书，再加上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五经，作为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。自明朝以后，不但根据“四书”考功名，而且规定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，但是《大学》被朱熹根据他的师承程明道和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编，南先生认为这样的改编是对先贤的大不敬，而且不赞成朱熹将亲民改为新民。南先生认为《大学》的思想源自于《易经》的乾卦文言，属于古代中原文化，自有其理路脉络，不必去篡改原文，而且对朱熹的批注和改编提出了批判，他说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批注所垄断的儒学，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。这样恢复《大学》原来面目的作法，以及重新解释《大学》，让后人跳出宋朝理学家的思维，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，对中国文化是很有意义的。

很多人以为打坐修定就是学佛，南怀瑾先生说静定修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甚至明说要学佛不如去看他的《原本大学微言》。在其讲述的《原本大学微言》中，对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的解释，引用了佛学大小乘修止修定的方法，并且逐字逐句加以说明，也讲了许多禅宗的道理和故事互相印证，使中国文化儒家道家本有的静定修养更加清晰详细，这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贡献很大，这也是数百年来宋明清理学家困于门户之见无法做到的事。

他解释《大学》的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明明德就是佛家的自觉，亲民就是觉他，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，静定修养是达到自觉觉他的步骤方法，儒家与佛家没有差别，只是我们不懂自己的文化而已。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的人格修养，才能外用，才能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与佛家的自度度他、自利利他是一样的。

“内圣外王”是儒家的核心理念，南先生在《原本大学微言》中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明明德的“内圣”（内明）之学，什么是明德，明德与“心物一元”的道，明明德之后，如何达到“止于至善”。因之讨论到相关的“格物致知”“知至而后物格”的“知”，这个“知”与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“知”是同是异，能知之性是什么，什么是能知，什么是所知，能知所知与明德的关系如何，知至又如何意诚，如何心正，心、意、识（知性）的差别如何，南先生融合了佛家的唯识学及禅宗加以阐述。又什么是“格物”，是否就是格去心中的物欲，“知至而后物格”到底如何解释，他引述《易经》及《中庸》来讲解。对内明之学，作如此深入的解释和探讨，在学术思想史上应该是少有的吧！

因格物的物而又讲到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之后，追求科技的发展与商业结合，提高、刺激、扩大了人对物质的欲望，为了掠夺物资而引发了战争，为了享受物质而破坏地球生态，使人走向“迷心逐物”自取灭亡的险境，若无“仁民爱物”“民胞物与”的圣人之德，则万万不可能领导天下走向太平。这是他对当前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提出的警语。

至于外王，有了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的身心修养之后，转入外用的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讲到齐家，他特别指出女性母德、母教的重要，同时指出自秦汉以后的帝王都是有大问题的家庭，许多生于深宫之

中，养在官妃太监之手的职业皇帝，怎么能够讲究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之道？“以德服人者王，以力假仁者霸。”南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帝王的治国方法作了梳理，与“大学之道”的内涵相对照，其中自有微言大义之处。最后他总结了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，以及西方文化的演变对中国的影响，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，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，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、偏见，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，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民族性，减少误解，而互相交流融会，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。

### 大胆评论王阳明学说的四句教

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学说，对明朝以后的思想影响很大，也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。王阳明最有名的四句教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南怀瑾先生 20 几岁，年纪很轻，在四川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时，不顾当时校长蒋介石对阳明学说之爱好，就大胆对此四句教提出质疑。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话，那么意之动的有善有恶是从哪里来的？有善有恶必然是从体来的，无善无恶的体怎么能生出有善有恶的意，这两句是互相矛盾的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这个知和那个本体有没有关系，有关系，那么在哲学上，王阳明的说法犯了三元论，有一个无善无恶心之体，又有一个有善有恶的意志，再加一个知善知恶的良知，是三元论，不是一元论的本体，这是有问题的。

且看后来南先生在其所著的《禅海蠡测》如何评论四句教，他说：明儒王阳明，远绍陆象山心法，世称其已近于禅，其著名之四句教，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，至有以之与禅宗心法并提者，实则大误。四句教云：
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为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若心之体，本无善恶，则此体为一废物，意动而忽生善恶，此善恶之来，纯出无根，而其于心体两不相关，何须为善去恶；为善去恶又与心之体有何关系？纵不为善去恶，心之体亦自无善无恶也，此其误一。

心既有体，在善恶之意未动以前，非绝无善恶，为潜伏于体中耳；此心可称之曰性善，亦可称之曰性恶；因善恶两俱潜伏。如心之体，在意未动前，是净明无过；则应准《大学》之义称之曰“至善”；否则当用《荀子》之意，称之曰“本恶”；何得言无善无恶。无与有乃相对意义，各代表绝对之词；天下之无，何能生有，既认有心之体，而云无善无恶；于辩正名辞上，不免过失；不若以“无”易“非”之为有当矣，此其误二。

四句教中，为学得着力处，只是一个“知”字；“良知”得辨其善恶，是以用为善去恶工夫，返此动意之初；如返之于无，则终成一个废物，明此心性何用？最不解者，此“知”之一字，又从何处生起？

“良知”若从心体自生，心体绝非无物，“良知”若从外来，于心体绝无交涉；况此一知者，为是意动，为非意动？若为意动，落在善恶中矣；若非意动，“知”之一字，即为心之体，何云无善无恶为心之体，此其误三。

阳明以一代儒宗，其四句教纲领，大误如此，世不之察，推为心性理学之极则，殊为识者所惜！

以上这段评论，在义理上分析辩驳得颇为透彻。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之学，究其核心，不离心性二字，心性乃儒释道三家之核心，儒家孟子讲“尽心知性”，中庸讲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早在战国时期，就有孟子与荀子

的性善性恶之说。道家讲“修心炼性”“性命双修”，佛家讲“明心见性”。王阳明心学影响中国文化数百年，并远及日本，作如此透彻之批判，此亦是中国文化史之大事也。南先生若非早年悟道，通达心性，智慧明了，何能作此大胆之评论。

## 引导学佛走向实修实证 倡导佛教与科学结合

佛教在印度原本就是修行的团体，传入中国，就被帝王大臣士大夫们所喜好，自汉末历经魏晋南北朝，净土宗、律宗、天台宗、成实宗、三论宗、俱舍宗、禅宗、华严宗纷纷建立，到了唐代，佛教文化在中国土地大放光彩，甚至主导了学术思想，与儒家道家三家鼎足而立，也因此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，其中尤以禅宗对宋明理学家影响最甚。然而理学之兴亦有弊端，所谓“平时静坐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。”，有高谈阔论、不切实际之风，所以到了明末清初，遂有黄梨洲、顾亭林、李二曲、王船山倡导经世致用之学，力图矫正。禅宗自宋朝之后也走向机锋转语之末流，越向后代发展，更严重的则是走向口头禅，一样是高谈阔论，不重实际修行。清末民初之研究唯识者或研究国学之大师大多倾向于教理之研究，却少有实修实证者。

南怀瑾先生自身得益于佛教禅宗，根据《维摩精舍丛书》记载，他于 25 岁参加四川禅宗大德袁焕仙先生主持的灵严寺禅七时悟明心性，来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阅《大藏经》，29 岁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，经贡噶上师认可，获得传授密法资格，亦曾多次闭关专修。到台湾后，除了主持禅七，讲解心经、金刚经、圆觉经、维摩诘经、药师经之外，于 1978 年讲述“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”，整理出书时取名为《如何修证佛法》，提出修学佛法的三个纲要，见地，修证，行愿。有关实际

修行的著作，除了《如何修证佛法》之外，还有《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》《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》《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》《南怀瑾与彼得圣吉》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以及最近新出版的《大圆满禅定休息简说》等，可见他对实修实证的重视。

他提示学佛者要通教也通宗，教理与修行并重，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，始终提倡实修实证的重要性。他区分了佛教、佛学、佛法三者之不同，佛教是宗教性的信仰，佛学是哲学学术思想的研究，佛法是认识清楚理论以后，以自己的身心作科学性的实验和求证。释迦牟尼佛当初只是带领一批僧团修行，形成宗教及学术思想则是后来的演变，实际修行方是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初衷。

对于佛教未来的发展，南先生主张脱掉宗教的外衣，与科学结合。1994年，他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禅七时，就定名为“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”。他认为佛家与道家的内容都是生命的大科学，唯识法相应与认知科学作综合研究，而且唯识学的科学条理性非常清晰，他晚年在“太湖大学堂”有个愿望，希望结合世界上的物理学家、生物学家、医学家、脑科学家、生命学家、心理学家等，作生命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，可惜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。

## 结语

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《现代文明的成坏》书中说：“所谓现代文明，也就是主宰人类生活将近三百年的主流文明，它起源于西欧，逐渐普及全球。而最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这一文明已呈衰象。”中国近百年来高喊现代化，从“中体西用”到“全盘西化”，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西化了，我们的思想已经西化了，我们的教育已经西化了，我们的服装

已经西化了，南怀瑾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中国文化只剩下“吃”了。西方的科技文明的确带给我们生活许多便利，但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就是幸福吗？不是的。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舒适，人们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与家人的相处时间，孩子失去了父母的关爱，造成许多心理问题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。人是有灵性的，除了物质的需求，还有精神的需求。

《现代文明的成坏》书中又说：“整个世界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虚无和冷漠，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。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，也不再问人如何跟别人相处，当然也更不知道整个宇宙与人的关系在哪里。”现代文明已经走向极端发展物质文明，精神文明则严重缺失，作为历史学家，许倬云先生看到了最近百年来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。今日的中国人是否应该看清世界的真相，是否应该看清西方文明的弊端，是否一如既往的一味崇洋，是否要重新审视中国五千年文明就一无是处、一无所长？

中国文化的特长是精神文明，是儒释道的心性之学，中国文化正是挽救此危机之良方。南怀瑾先生已经离世了，他已经把中国儒释道的主要经典讲述完了，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心愿已经完成了。身为中华儿女的炎黄子孙们，如能秉持“己立立人”“己达达人”之中国文化精神，为自己之安身立命，为家庭之幸福快乐，为国家之长治久安，为世界人类之太平，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做吧？！